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孟子与《孟子》

查昌国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受教篇	员
	(一) 战争、变法、尚贤、礼士	员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	
	(二) 幼受慈母之教	员
	——孟子的少年时代	
	(三) 受业子思门人	员
	——孟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二	游历篇	猿
	(一) 居邹聚徒讲学	猿
	(二) 道既通初游齐	猿
	(三) 游宋论政先得人	猿
	(四) 受赠于薛、闲居于邹	猿
	(五) 赴滕国助行仁政	猿
	(六) 游梁说王论义利	猿
	(七) 再次游齐任卿相	猿
	(八) 晚归故里撰《孟子》	猿



三	思想篇	苑源
	(一) 仁宅义路	苑源
	——孟子的仁义思想	
	(二) 集义与养气	愿袁
	——孟子的“浩然之气”	
	(三) 四心、四端、四德	怨园
	——孟子的性善论	
	(四) 大丈夫	怨袁
	——孟子的理想人格	
	(五) 知命、俟命、立命、正命	员困
	——孟子的天命论	
	(六) 由“人心”到“仁政”	员园
	——孟子的仁政学说	
	(七) 恒产、恒心、制民之产	员愿
	——孟子的经济思想	
	(八) 民贵君轻、政得其民	员缘
	——孟子的民本思想	
	(九) 乐道忘势，师友自处	员源
	——孟子的君臣关系	
四	成圣篇	员园
	(一) “显学”巨擘、“邪”“蠹”之学	员园
	(二) 从“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	员园
	(三) 唐代孟子升格运动	员苑
	(四)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	员员
	(五) 元明时期尊孟	员苑

五	不朽篇	员员
	(一) 泽被后人	员员
	——孟子思想的影响	
	(二) “亚圣”的现代意义	员苑

一 受教篇

（一）战争、变法、尚贤、礼士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景观就是战争，国家的基本职能似乎就是战争，以至于当时人们称呼其时的大国为“战国”。如赵国名将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国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赵奢、苏代两人所说的“战国七”，就是战国七雄。正因为战争是当时社会的显著特点，西汉刘向把战国之世作为大国之称的“战国”一词，用作历史时代名词，指称春秋、秦朝之间的那段历史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以战争频繁著称，战争的酷烈程度也是空前未有的，而当时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城掠地，灭人之国。所以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即当时所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无尽的战争，使千百万人死于战场，无数人流离失所，沦为饿殍，

员



竟至倒毙于沟壑。同时战争也加速了宗法制的崩溃、宗法君臣关系的瓦解，以及宗法贵族阶层的灭绝。

宗法贵族阶层的衰亡 在西周宗法分封制度中，君臣之间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周天子称异姓诸侯为诸舅，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天子和诸侯有如一个家族集团。各诸侯国的君臣之制，也是一依血缘嫡庶而定，即以宗庙谱牒定君臣名分与政治尊卑。在这种政治体制内，与君主相对的臣，当时叫卿、大夫，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君主的权力亦不能超出于宗族集团之上。因此，西周春秋之世，君位的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残酷的内部倾轧，使“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一“自古以来”的历史进程，被战争人为地加速了。据许倬云研究，《左传》中所记的强宗大族，在周简王十四年（前 缘圆）与周景王二年（前 缘猿）之间有 圆猿个，到周敬王七年（前 缘猿）只剩下 员源个，从周敬王三十八年（前 源圆）至周贞定王五年（前 源源年）间，仅存 苑个。这些消失了的世家大族，有的是毁灭于兼并战争，更多的则是丧亡于贵族内部的互相吞并。典型的例子是晋国公族的覆灭。周襄王三十一年（前 源圆），狐氏家族灭亡；周灵王二十年（前 缘圆），栾氏家族流亡国外；周敬王六年（前 缘源），祁氏、羊舌氏两家相继覆亡；周敬王二十八年（前 源圆），范氏、中行氏也完了；最后是周贞定王十五年（前 源猿），智圆

伯被韩、赵、魏消灭。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晋国世家大族，作为一个阶层几近于绝迹。晋国的这种现象，其他各国亦比比皆是。

宗法贵族数量减少、整个阶层的没落，使君主与贵族原有的宗法君臣关系的平衡被打破，君主渐渐脱离亲属关系的束缚，得以用异姓人才来填补贵族没落所留下的空缺，或以异姓人才来取代或排挤贵族和世袭之臣。异姓之臣和同姓之臣对君主权力消长所起的作用相反。《万章下》中孟子说，有两种大臣：一为贵戚之卿，一为异姓之卿。前者与君主同姓，后者与君主异姓。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对君主所承担的责任也迥异。贵戚之卿的政治责任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谏）而不听，则易位（把君主废弃，改立新君）。”异姓之卿的政治责任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辞职）。”君主对这两种人的权力也不同，君主对同姓大臣贵之、贱之的权力甚小，对异姓大臣则拥有贵之、贱之、去之的绝对权力。异姓大臣进入朝廷的唯一凭藉是贤能，在朝廷中的唯一依靠是君主，其保住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竭诚为君主效力；君主也正是赖异姓之臣的力量，方得把原本分散于同宗贵族手中的权力逐渐集中到自己手中，使君权得以日益加强。君主和异姓大臣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君主集权日渐加强，一是异姓之臣的得势。战国时代的异姓之臣以士为主体，



故异姓之臣的得势，实乃士阶层的得势。

士阶层的兴起 士本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处于大夫和庶人阶层之间，他们熟悉典策礼仪，属于有知识者。作为贵族阶级的士，本是附属于诸侯、卿、大夫等世家大族，其职掌为贵族各部门的基层事务。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动荡，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周敬王十年（前 476），晋国史墨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句话当然应从广义上去理解，即包括春秋以来一切亡了国和破了家的世家大族的子孙，他们下降为庶人，事实上也大多流落为士。原本附属于这些世家大族的士，随着其主人的失势，失去了生存的依托，散落入民间，以传授礼仪文化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这样，士流落民间，同时也就把原为贵族垄断的文化带到民间，导致庶人中“民之秀者”也上升为士。由于士阶层恰好处于贵族和庶人之间，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交汇之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快速流动，士的人数遂随之大增。士人数的剧增，尤其是庶人上升为士，对传统士阶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了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改变。变化之一，士由贵族变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民”；变化之二，士由贵族底层的“有职之人”变为“士无定主”，即依靠知识技能糊口的文士。这种文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本书以下不作特别说明的士，都是指这种文士），即现代所说源

的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



孔子杏坛设教图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士之第一人。孔子师徒相较于传统的士，其出身最能说明作为知识阶层之士的社会属性与特征。孔子先人为殷贵族，他则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人，他是从“三姓之后”沦落下降为士的显证。孔子学生中，以贵族身份学于孔子者，有鲁国的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

牛，剩下的则多为微贱的庶人。如颜渊居陋巷，死无棺木，闵子骞着芦衣，仲弓贱人，子贡为商。他们都是学于孔子，才得以跻身于士林。孔子师徒及其后的士，立身的唯一凭藉是知识技能，传授知识技能是他们的基本谋生手段。传统之士，也授徒和传授知识技

缘



能，但孔子师徒和传统之士的差别在于不仅传授知识，并且还传授“主义”。如孔子讲礼，但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更重要，这个“礼之本”就寓含了孔子的道，或者说是孔子的“主义”。孔子和儒家都认为，士之学，也是为了“志于道”。这个“道”也就是“主义”。孔子之前的士，也许在朝廷或私室任官职，但有“主义”、有操守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士，孔子当称第一人。在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把“道”贯注于士的精神中，要求每个士都能超越一己和群体的利益，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成为社会良知的守卫者和见证人。孔子师徒处于士阶层初兴时期，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对其后儒家乃至整个士阶层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师徒及儒家，以及其后次第兴起的诸子，都秉承了孔子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抱负，他们谋生的主要职业是授徒与做官，而以做官为主要志向所在，他们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故汲汲以求仕进是士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士出仕做官经历了一个由坎坷而顺利而畅通无阻的过程。孔子一生仕途坎坷，经常如丧家之犬，其在世时，弟子也多为贵族的家臣，或宰邑的大夫。这是平民之士以学术进身、取代贵族的开始时期。孔子死后，弟子子夏为诸侯师，声名显天下；田子方、段干木一辈士人则更是以道术自重，气傲王远

侯。孔子死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士的社会地位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战国初年的战争、变法、尚贤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变法 进入战国时代，为图谋富强，增强战争实力，各国都先后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变法。变法多是围绕外务兼并、内废公族两点展开。各国都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劳者有食，有功者得爵位。相伴而行的则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赐爵制和郡县制。郡、县和宗法分封制下的卿大夫封邑不同：封邑的官更多是卿大夫的家臣，由卿大夫任命；郡、县长官直接由国君任免，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君主手中，对官吏一般均是采用俸禄制度。这些变法措施的推行，剥夺了贵族的特权，增强了君主权力，也为士阶层参政、终至于成为官僚主体，创造了条件。

另外，变法加速了春秋以来就出现了的宗法关系瓦解的进程。自孔子始，士就开始挣脱宗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他们思想中轻去其乡，宗国观念淡薄。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为以士”。自始，固守乡土，不足为士，似乎就成了士的一条共识。战国时期诸国的变法，不仅为士人出仕提供了广阔空间，亦使士人的宗法观念、乡土观念、宗国观念更加淡漠，在两者综合作用下，加速了士的流动。他们在这个国家不为君主所重，可以很轻易地游走到另一个国家，去寻求获



得施展才华的机会。自孔子起，士开始游走四方，到战国，则是无士不游，“游士”亦成为此间士的一大特征。

尚贤 尚贤是战国的风尚，也是当时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战国时代，国家的管理事务，无论是内政，抑或外交，都比春秋时期更为复杂。而险恶的国际形势，又迫使各国必需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斗争，甚至些微差错，都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以出身任官、爵禄世袭的传统制度，已无法应对当时波谲云诡的社会形势。战国时代再也没有人玩得起，或玩得转这套制度，各国用人都不能不以任贤使能为原则。于是网罗贤士、尊重贤士、充分发挥士人力量，日渐成为君主为政之第一要务。

战国君主中最先以礼贤重士著称的是魏文侯。史称，魏文侯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段干木出身“晋之大狙”（市场经济人），后成为名士。魏文侯乘车过段干木家门口，则站立手扶车厢横木以示致敬。其佣人不理解，魏文侯解释说，段干木乃天下贤者，隐居在此，声誉响于千里，我安得不向他致敬？段干木富于德与义，寡人拥有权势与财富，财富不如道德尊贵，权势又敌不过道义。《史记·魏世家》记，魏太子子击一次在朝歌遇见魏文侯之师田子方，即引车避让，并下车拜见，田子方不予礼答。子击愠而不悦地问田子方：“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

田子方断然说：“亦贫贱者骄人耳。”理由是“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可毫无顾虑地拂袖而去。他离开君主，有如脱去无后跟的拖鞋一样的方便，因此他可以傲视天下一切人，包括君主。而君主骄人，则要失其国，亡其家。这段材料恰好从君主和士人两方面，道出了战国前中期士人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士是政治中的紧缺资源，故士可以气傲王侯，高尚其事，自由地选择君主。就君主言，则是得士则得国，失士则失国，故君主欲谋求富强，就得尚贤礼士。魏文侯正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于世，魏国也成为其时第一大强国。于是各国纷纷仿效，到孟子之世，社会尚贤之风日益高涨。最为著名的是齐国设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天下名士入居学宫，不任官职而论国事者，享受上大夫的待遇。士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如淳于髡游齐国，享受极高礼遇；田骈享受俸禄千钟；即便是退隐的庄子，也与梁惠王之相惠施为友，常相往来，时能声气。士人的势力甚至可以左右天下局势，如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总之，战国之世，士已成为决定国家兴亡的一大社会阶层，各国尊贤实际上都是礼敬贤士。各国都以尊贤、网罗士人为其效力作为执政的要务，因此，尚贤礼士成为战国时代与战争、变法等量齐观的一大社会景观与特点。



(二) 幼受慈母之教

——孟子的少年时代

孟子的名与字 孟子，战国邹人。东汉赵歧《孟

子 题 辞》

说：“孟，
姓也；子
者，男子之
通称也。”

在先秦，姓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即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在孟子时代，孟是孟子的氏，而不是孟子的姓。到汉代姓氏开始混而为一，故



明代孟子石刻像

赵歧说“孟，姓也”。“子”，也不是孟子的名字，而是男子的通称或对学者的尊称，如庄子、荀子。《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名轲，孟子也自称为轲，这从他回答北宫^稽“轲也尝闻其略也”（《孟子·万章下》，以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话中可以得到证实。古人重视字，士以上的人，到^冠岁便给他取个字，自后便不称名而称字。相传孟子字子居（一字子车，又作子舆），这个说法不可靠。孟子的字最早见于《孔丛子》，《孔丛子·杂训》说：“孟子车，儒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晋人傅玄在《傅子》中又说孟子字子舆，舆也可指车，故“子舆”或是从“子车”引申来的。可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到孟子的字，东汉研究孟子的名家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名轲，字则未闻也”。《史记》、《汉书》未提到孟子之字，赵歧说不知道，王肃、傅玄怎么知道？宋代王应麟就此表示疑问说：“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坷，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疑皆附会。”所以孟子“字子车”的说法不可靠。但是孟子肯定有名有字，他的“字”没有流传下来，徐干在《中论·序》中有个解释，他说：“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所以如此的原因，“皆由战国之世，乐贤者寡”，以至当时的人未把孟子的“字”记下来，终致于淹没无闻。看来，孟子确实没有可信的“字”流存于史籍中。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能肯定，古今对此有各种推测，至今仍无确切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极为缺乏。有关孟子的生卒情况，《孟子》中没有确切说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只字未提，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其《孟子题辞》中也无这方面的记述。到唐宋时期开始有人考证孟子的生卒年月，但也是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孟子被推尊为亚圣，《孟子》成为国家开科取士的经典，研究《孟子》的著作越来越多，考证孟子生卒年月的也多了起来。不过由于缺乏直接可信的资料，各家的考证也多是推测之词。将各家推论与《孟子》原书来核对，目前学术界多倾向于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前 372）前后，其卒年盖在周赧王二十六年（前 249）前后。



双圣诞生地碑

邹鲁儒风

孟子出生于邹国。邹是一个古老的封国，在春秋为邾国，至孟子时改名为邹。邹国位于现在山东邹城市的南部，当时是与鲁相邻的小国，后

并入鲁国。邹国、鲁国同处洙泗之间。《汉书·地理志》记载，洙泗地区自周公之子伯禽封鲁以来，受周文化浸润甚深，“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遗风余韵逮至战国庄子之世，邹鲁地区仍是当时中国延续、保存周代礼乐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庄子·天下》说，邹鲁之士懂得《诗经》、《尚书》与《礼》、《乐》及存在于其中的古代道术。直到东汉班固时，邹鲁之地好学之风犹盛于他邦。孟子就是生长于这样一个文风昌盛、儒学积淀深厚的邹地。而孟子的家离孔子的故乡曲阜很近，以至孟子惊叹自己距离圣人的家乡竟是如此之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邹鲁之地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孟子的成长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家族也或是孟子成为博学大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孟孙氏家族 孟子是鲁国贵族“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中孟孙氏的后代。后来孟孙氏家族衰落，孟子所属的一支便迁居到邹国。正因为孟子祖先是鲁人，其先祖墓地在鲁国，因此孟子的母亲仉氏逝世后，仍归葬于鲁国。孟孙氏家族是一个贤人辈出、文化修养很高的家族。《论语·雍也》篇记载：孟之反不夸耀自己，在与齐国战争中，鲁军溃退，他走在最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他鞭打着马说道：“不是